



中国对外投资动因、 制度调节与地区差异

陈岩, 杨桓, 张斌

北京邮电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北京 100876

摘要:通过整合制度观和资源观,将两者放在统一的分析框架中,考察中国企业如何利用母国制度优势克服竞争性资源占有方面的劣势,从而实现国际化战略目标。与传统思路分别分析各种内部资源和企业外部制度因素对于企业国际化的作用不同,运用调节变量的研究方法,分析母国制度因素对于资源与国际化关系的调节作用,利用2003年至2009年中国省级对外投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政府资源配置能力对于不同类型的资源与对外投资的关系确实起重要的调节作用,但调节的方向和强度不同,并受地区差异的影响,表明制度因素对对外投资的影响是有条件的。通过发现制度的调节作用,为中国企业为何在缺乏企业特别所有权优势的情况下仍然能够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一个全新角度的解释。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制度观;调节效应;地区差异

中图分类号:F83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334(2012)03-0112-09

1 引言

由于实施走出去战略可以使一国企业在更大的范围、更广的领域和更高的层次上参与国际资源配置,在全球范围内获取稀缺资源,从而提升其竞争力和绩效,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FDI)成为企业寻求可持续竞争优势的主要战略选择之一^[1]。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FDI总体下滑的背景下,中国OFDI仍持续增长,2006年至2010年,中国非金融类OFDI流量合计2166亿美元,年均增长38.8%,在全球的排名由2005年的第18位跃升至第5位,迈入OFDI大国行列,在新兴经济体中居首位^[2]。

由于制度环境和所处发展阶段等原因,中国的OFDI表现出传统理论无法解释的若干特点,如与传统跨国公司主要为非国有企业不同,许多中国对外投资企业中政府参与程度和国有经济比例都比较高;与发达经济体的企业通常以渐进的方式国际化不同,很多中国企业都是以加速的方式实现国际化

的,并购而非绿地投资成为中国企业OFDI的主要形式,在2009年和2010年并购约占OFDI量的40%以上^[2]。

由于中国企业是在并不具备Dunning折衷范式所定义的所有权优势(特别是竞争性技术和管理资源)的情况下进行对外投资的,所以基于资源的理论对于中国OFDI现象难以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一些针对中国OFDI的最新研究已经开始关注制度因素的重要作用^[3-6],被视为是传统跨国公司所不具备的、决定中国企业OFDI的特殊的“制度性优势”^[7]。可见,对于像中国这样政府调控程度仍然较高的新兴经济体国家,从制度视角分析企业的OFDI决策是极有价值的^[8-10]。然而,已有研究成果没有细致分析究竟是何种制度因素以何种方式影响企业OFDI决策,具体而言,缺乏关于具有显著中国情境特质的制度因素,如政府参与程度和政府资源配置能力如何分别与企业有形资源、研发资源和技术市场资源互动,使企业能够更有效地利用资源进行OFDI的

收稿日期:2011-09-26 修返日期:2012-04-24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1073087);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10YJC790028);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9122019)

作者简介:陈岩(1970-),男,山东曲阜人,毕业于吉林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为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国际商务管理和跨国经营等。E-mail:itrade8@gmail.com

深入分析。

2 相关研究评述

资源观主要从资源的视角解释企业战略选择和决策,它强调企业的内部资源如何决定企业的竞争力和绩效^[11]。虽然企业有各种资源,但资源观认为,无形资源具有稀缺性、不可仿制性和不可替代性等特征,所以企业对外投资决策主要取决于企业所具有的无形资源。资源观对于解释处在较为稳定、成熟的制度环境和完善的机制中的企业行为较为有效^[12],因为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下,企业战略选择更多是自主行为,而非与外部环境互动的结果,也就是说制度对于企业行为而言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外生变量。

由于 Dunning 等^[9]的折衷理论对于新兴经济体企业 OFDI 缺乏足够的解释力,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转向从制度视角考察这些企业 OFDI 的动因^[3,5-6]。制度观认为,制度的作用在于通过消除不确定性和建立稳定的结构减少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众所周知,资源观忽略了企业外部环境特别是制度环境对经济主体微观行为的影响^[13-14],而制度观恰恰认为企业所处的外部制度环境是影响企业行为的重要参数,这类制度力量包括正式制度(如政治、法律、经济、社会制度等)和非正式制度(如文化和风俗习惯等)^[14-15],如 Buckley 等^[8]分析了政府对企业的扶植、国家的信贷政策、经济自由化程度和文化相似度等制度因素对 OFDI 的决定作用。新兴经济体通常处在市场机制发展的初期,制度特别是正式制度虽然在形成中,但仍然严重缺失,在这种制度环境下,企业资源通常没有得到充分利用,而制度则对于企业战略选择具有更强的解释力^[16]。按照制度观,企业 OFDI 决策不仅取决于其所拥有的竞争性资源,同时取决于所处的外部环境,各种外部环境参数或者促进或者抑制企业 OFDI。

近年来,有关 OFDI 的最新研究已不再局限于制度因素对投资动因重要性的探讨,而是上升到讨论制度因素对企业 OFDI 影响机制的层面。Dunning 等^[9]曾将制度视作“创造型资产”,认为与有形资产、规模经济、市场结构相比较,制度更能够影响企业的竞争优势。制度因素通过激励和约束在强度和方向上对 OFDI 起到决定性作用。熊伟等^[4]认为,政府政策可以通过影响企业的人才优势、技术优势、规模经济和资本优势等,进而影响企业的所有权优势;而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经济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等都对企业所有权优势产生影响。阎大颖等^[7]认为,政府的市场导向、政策性投入和法制环境等一些制度变量对研究企业运作的空间维度有重要意义。

上述基于制度视角的研究有若干共同缺陷。①虽然这些研究均发现了制度因素对于 OFDI 的重要性,认为与发达经济体企业凭借自身的竞争优势实现国际化不同,中国企业由于缺少竞争性战略资产,对外投资时更多的是利用母国制度方面的优势弥补

其所有权优势的不足。但是,在中国情境下作用于企业资源的制度因素(如企业参与程度和政府资源配置能力)对 OFDI 的决策机制仍然缺乏深入的理论解析和实证检验。容易理解,制度因素(如补贴)可以直接影响企业 OFDI,但很多其他制度因素则必须通过一些传导机制对企业 OFDI 决策产生影响。②很多研究分析制度的作用时,忽略了企业内部因素的决定作用,这实际上是把内部因素(如资源)看做常量,这是与现实世界完全不符的假设。所以对于企业 OFDI 动因的完整分析必须同时考虑企业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任何只包括其中一类因素的分析都会产生严重的偏差。③已有基于制度的 OFDI 分析通常将母国作为一个整体,这实际上是假定各地区的制度都是以相同的方式和程度影响企业 OFDI。由于母国各地区间在制度上的异质性,制度因素对 OFDI 的直接作用和调节作用也是一种地理现象。以中国为例,不仅各地区在制度上存在差异,由于各种原因,同一政府制度在各地区对企业行为的影响也不尽相同。所以,只有把制度的地理区纬度纳入分析框架,才能得到真正具有政策价值的研究成果。

与已有研究仅着眼于资源或仅着眼于制度视角不同,本研究整合这两种理论观,重点分析制度因素如何作用于资源从而影响企业 OFDI 决策,实证检验母国各地区之间制度层面的异质性特征对于 OFDI 的不同影响,探究中国 OFDI 地区增长不平衡背后的原因和动态趋势,不仅有助于中国结合地区异质性制定 OFDI 政策,同时对于利用 OFDI 平衡国内区域发展也有重要意义。

3 假设提出

3.1 资源因素在决定 OFDI 动因中的作用

由于资源观强调企业拥有独特资源的优势和整合资源的能力对于企业竞争力和绩效的影响,它对于解释这些资源如何被企业用来通过 OFDI 实现国际化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从资源的角度看,有形资源、研发资源和技术市场资源等均是重要的企业资源。有形资源主要指固定资产,包括工厂、设备、土地和其他资本品。Foss^[17]认为,由于有形资源容易从市场获得,并被竞争对手仿制和超越,所以不构成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因此对于企业 OFDI 并不是非常重要。然而,有形资源与无形资源具有相互补充的特点,有形资源是比较典型的基础性资源,是其他类型资源发挥作用的基础,无形资源作用的发挥必须以有形资源为依托^[18]。事实上,按照经典跨国公司理论,企业拥有一定水平有形资源和资本是其进行对外投资的前提,所以一定水平的有形资源构成 OFDI 发生的前提,在有形资源方面具有优势的企业会在 OFDI 方面占有先机,因此提出假设。

H₁ 企业的有形资源与 OFDI 正向相关。

根据资源观,并不是所有的资源都拥有相同的潜力能够为企业带来持续的竞争优势,因此更应该关注优势创造型资源的特征。Barney^[19]认为,优势创造

型资源必须满足有价值的、稀缺的、不可仿制的和不可替代的4个条件。研发资源为企业创造储备科学知识,使企业有能力生产差异化产品,所以是重要的优势创造型资源,具有这种资源的企业更容易在国际市场获得成功^[18,20]。研发资源对于企业 OFDI 的重要性与 Dunning 等^[9]的折衷范式是一致的,折衷范式中的企业所有权优势主要就是研发优势。虽然很多新兴经济体企业在没有明显科技优势的情况下仍然能够成功进行跨国投资,但这并不意味着研发优势在企业国际化过程中不重要。事实上,企业在研发方面仍然要达到一定的门槛水平,因为即便企业对外投资的动机是为了寻求新的战略资源,如果企业在研发方面没有达到一定的门槛水平,它也没有能力获取这样的战略资源,因为企业具有的研发能力同时反映企业的吸收能力^[21]。由于企业必须把在母国多年培育和生成的头脑地图、组织结构、体系和过程转移到陌生的文化和制度环境中,国际化过程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任务^[22-23]。企业只有具有一定的吸收能力,才能实现这些转移,从而部分地弥补其海外投资时所面临的外来者劣势,因此提出假设。

H₂ 企业的研发资源与 OFDI 正向相关。

技术市场资源也是一种与企业竞争优势密切相关的无形资源^[24]。虽然研发资源很重要,新兴经济体企业缺乏独立研发能力,常常依赖技术市场获得技术资源或专利产品。在规范和发达的技术市场上,技术资源和知识产权受到法律的有效保护,投机行为受到最大限度制约,交易成本水平符合企业预期的范围^[25-26]。而在欠发达的技术市场上,法律无法充分保护买卖双方,额外交易成本妨碍企业进入交易市场,所以企业所在地区技术市场发展程度是影响企业研发能力乃至战略选择的一个重要的制度参数。相对发达的技术市场可以弥补企业在技术上的劣势,使技术不占优势的企业仍然可以进行 OFDI。由于技术市场资源可以弥补企业研发资源的不足,因此相对完善的技术市场的存在可以解释为什么新兴经济体企业在缺乏竞争型研发资源的情况下仍然可以进行对外投资的悖论。基于上述讨论,本研究提出假设。

H₃ 技术市场资源与企业 OFDI 正向相关。

3.2 制度因素对于资源与 OFDI 关系的调节作用

制度观强调制度环境如何影响企业的竞争优势和战略选择。基于对中国制度特质性和数据可得性的考虑,本研究主要考虑影响中国企业 OFDI 的两种重要制度因素,即政府参与企业程度和政府资源配置能力。政府通常通过在企业中占有股份来实现政府的意志和政策目标,本研究用国有企业份额反映政府参与企业程度。制度因素不仅对企业 OFDI 有直接影响,还对企业 OFDI 产生间接影响。本研究主要关心后者,即制度因素对资源与 OFDI 关系的调节作用。这是因为,在新兴经济体中由于制度的特殊作用,因制度环境的不同资源对企业对外投资产生不同的效果。

政府主要使用财政和金融两个工具来协调微观经济活动和政府政策目标,由于数据可得性,本研究主要考虑财政工具。政府对全社会资源的配置可以通过政府财政支出占 GDP 的比重反映,该项指标实际上反映政府所支配的资源在社会资源总量中所占的份额。在一个正常运转的经济体系中,政府财政支出占 GDP 的比重越高,政府对企业行为的影响越大。政府资源配置能力可以增加企业的有形资源,如通过政府资源配置,企业有可能获得便宜的土地,某些企业甚至可以通过政府的转移支付增加有形资源。政府资源配置能力也可以充实和提升企业的研发资源和技术市场资源,如政府通常通过财政手段支持企业研发投入以及对新产品开发进行补贴。许多国家的政府对高科技行业企业提供各种补贴、免费提供各种培训以及对人才引进进行补贴,如在中国中央组织部的“千人计划”项目中,政府为企业在海外招揽科技人才,并为这些人才提供巨额收入补贴;再如在转型经济体中,由于中介市场服务不发达,政府常常不得不承担中介机构的职能^[27],利用财政支出为企业提供各种服务,如提供潜在东道国市场信息以克服企业信息不对称问题,中国政府通过驻外使馆帮助国有企业搜集国外客户和法律信息;政府还组织投资促进活动,为国内外企业合作牵线搭桥等,这些服务都为企业降低交易成本。相反,当政府财政支出比重下降时,政府不得不削减上述各种服务,使企业通过政府提升有形资源、研发资源和技术市场资源的机会减少,最终制约企业进行对外投资。所以,新兴经济体政府相对强大的资源配置的调节作用能够部分地弥补企业竞争型资源的不足,由此可以解释为什么企业在本身无形资源不足的情况下仍然能够实现对外投资的现象,因此提出假设。

H₄ 政府资源配置正向调节企业的有形资源、研发资源和技术市场资源与企业 OFDI 水平之间的关系。

在国有股份比例高的企业中,政府能够给企业提供各种稀缺的有形资源,或者减少企业获得有形资源的成本。例如,政府可以帮助企业以低于要素市场的价格获得土地和生产经营用厂房、以低于市场水平的利率获得信贷等,从而使企业获取成本优势。通过提供独特资源,政府还可以帮助企业改善有形资源的组合,增加互补资源,如科技资源与人力资源的组合可以使资源产生 $1+1>2$ 的效果。因此,拥有政府支持的企业能够拓宽有形资源的范围,并且能更好、更有效地利用这些资源进行对外投资。

由于要素市场不够发达,政府占有股份较多的中国企业可以通过政府以较低成本获得有价值的无形资源(如行业进入和经营许可等),并受到国家支持和保护(如设立行业进入障碍等)。有鉴于此,Lu 等^[28]认为政府参与对企业而言可以说是一种与制度相关的战略资产。在国际化扩张过程中,中国很多企业能够在政府的支持下获得各种有价值的战略资源,如国外市场信息以及国际巨头企业的网络关系

等^[3]。同时,有政府支持的企业或者行业,相对而言更容易获得某些政府控制的重要科技资源。有政府支持的企业更方便使用国有研发机构的科研成果,使企业研发资源多样性并优化研发资源组合,从而提高企业通过科技创新进军国际市场的能力。按照同样逻辑,政府制度支持可以帮助企业提升其技术市场资源。政府支持的企业可以从政策银行(如进出口银行)获得优惠贷款,可以以高于竞争者的出价在技术市场上获得稀缺的技术资源。另外,政府本身是技术市场的裁判员和监督者,这也有利于国有企业在技术市场上的竞争。尽管政府参与有时会给企业带来一定的消极影响,如国有企业除了考虑利润指标之外,还需要满足社会的关注和需求,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有可能有悖于利润最大化目标。但就中国企业整体而言,考虑到政府一直以来对企业行为的重大影响,政府参与的程度越高,就越能帮助企业克服竞争劣势,从而实现国际化战略。因此提出假设。

H₅ 政府参与企业程度正向调节企业的有形资源、研发资源和技术市场资源与企业 OFDI 水平之间的关系。

4 数据和方法

4.1 数据来源

以往针对中国 OFDI 动因的研究多是选择中国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投资数据,这样的数据更多的考虑东道国的吸引因素,不能完全体现中国制度因素的主动安排和地区差别。考虑到制度在各地区间的差异性,本研究使用省级数据。根据数据的一致性和可获得性原则,本研究选取中国 OFDI 涨幅较大的 2003 年至 2009 年中国各地区 OFDI 的面板数据作为样本,由于西藏的数据在各变量统计中不完整,故样本中将西藏的数据剔除。本研究中四川省包括现四川和重庆的数据,由此可以得到从 2003 年至 2009 年 29 个地区的面板数据,原始数据来自《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03-2009)、《中国科技年鉴》(2003-2009)、《中国统计年鉴》(2002-2009)。

4.2 研究方法

(1) 因变量

按照已有研究^[8,29],选取各地区的实际 OFDI 作为因变量,不仅因为这个变量更能准确反映 OFDI 平稳的、持续的变化,更重要的是选取这一变量便于本研究估计结果与已有研究成果进行比较。

(2) 解释变量

在资源变量方面,使用各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额(fixed investments, FI)表示有形资源,采用各地区在研发上的投入(research & development, RD)衡量研发资源的状况^[18],采用各地技术市场交易额(technology market turnover, TMT)衡量技术市场资源情况。

在制度变量方面,用政府财政支出占 GDP 的比重(GE)反映政府的资源配置能力,该变量不仅能够反映政府所支配的资源在社会资源总量中所占的比

重,还可以衡量政府参与和调控经济的能力;并且,这一相对指标能够剔除通货膨胀因素的影响。相对于其他性质的投入而言,国有经济的参与意味着更易于享受政府各项优惠政策,从而拥有制度带来的优势^[8]。中国政府一直通过国有控股企业来实现政府的政策目标,如就业、保护弱势和控制支柱产业等,因此本研究采用国有资产总量占企业资产总量的份额表示政府参与的程度(government involvement, GI)。

除此之外,还采用两个对 OFDI 有重要影响的控制变量。已有研究考察若干对企业 OFDI 产生影响的宏观因素,如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程度等^[30]。本研究用各地区生产总值表示经济发展水平(EDE),用出口额反应对外开放程度(OPEN),以控制这些宏观经济因素对 OFDI 的影响。

4.3 调节变量分析方法的引入

调节变量被定义为系统地改变一个解释变量与一个被解释变量之间关系的方向和/或强度的变量^[31]。在本研究中,制度因素影响企业各种资源与 OFDI 之间关系的方向和强度,因此借鉴调节变量的方法对制度因素的调节效率进行测定,调节效率是指某个第 3 个变量有效地影响了 X 对 Y 的作用关系。对调节变量的测度主要是通过调节变量回归分析(moderator regression analysis, MRA)方法来进行,通过检验以下 3 个回归方程是否有显著性差异来识别一个假设的调节变量。

$$Y = \alpha + \beta_1 X + \varepsilon \quad (1)$$

$$Y = \alpha + \beta_1 X + \beta_2 Z + \varepsilon \quad (2)$$

$$Y = \alpha + \beta_1 X + \beta_2 Z + \beta_3 XZ + \varepsilon \quad (3)$$

其中, Y 为被解释变量, X 为解释变量, Z 为调节变量, α 为截距项, β_1 为 X 的回归系数, β_2 为 Z 的回归系数, β_3 为 XZ 的回归系数, ε 为残差项。

如果 $\beta_3 = 0$, $\beta_2 \neq 0$, 即(3)式与(2)式没有显著差异,那么 Z 不是调节变量,只是一个普通解释变量;如果 $\beta_3 \neq 0$, $\beta_2 \neq 0$, 那么 3 个方程都显著不同,此时 Z 为调节变量,若 XZ 的偏回归系数检验显著,则调节效应显著。

4.4 模型方法

在影响形式判定阶段,本研究通过似然比检验确定影响形式,将“固定效应是多余的”设为原假设 H₀, 检验结果拒绝原假设,因此采用固定效应影响模型。根据以往关于变量调节作用的研究^[32],结合前文对于制度因素影响资源因素的文献评述,本研究以资源变量与制度变量的交互项作为解释变量,研究制度因素对资源变量与 OFDI 关系的调节作用,从而建立模型如下。

$$\ln OFDI_{i,t} = C + \beta_1 RV_{i,t} + \beta_2 MV_{i,t} + \beta_3 CV_{i,t} + \beta_4 CV_{i,t} \cdot MV_{i,t} + \varepsilon \quad (4)$$

其中, i 为不同地区截面; t 为时间; RV 为被调节的 3 个资源变量,包括有形资源(FI)、研发资源(RD)和技

术市场资源(*TMT*);*MV*为要研究的制度调节变量;*CV*为控制变量,包括经济发展水平(*EDE*)和对外开放程度(*OPEN*); β_4 为控制变量和制度调节变量交互项的回归系数。由于政府资源配置变量是百分比的形式,如果进行自然对数处理会出现负值,因此采用半对数形式构建以上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5 实证结果

5.1 总样本结果

表1给出制度调节作用的回归结果。表1中,模型1是基础模型,仅包含控制变量和资源变量,结果显示有形资源和技术市场资源对*OFDI*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该结果支持 H_1 和 H_3 。然而,研发资源变量虽然符号正确,但在统计上不显著,这一结果不支持 H_2 。在模型2中,加入政府资源配置能力和政府参

与企业程度两种制度变量,结果显示这两种制度变量均对*OFDI*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该结果支持本研究理论框架。在模型3~模型8中,分别加入两种制度变量与3种资源变量的交叉项,结果显示,与模型1和模型2相比,模型3~模型5的 R^2 值有所增加,证明了在原模型基础上加入调节变量*GE*增加了相关模型的解释力度;而模型6~模型8中 R^2 值虽然没有明显的增加,但其值已足以说明调节变量*GI*具有一定的解释能力。政府资源配置能力与3种资源交互项的系数为正值,而且在统计上显著,表明政府资源配置能力对于3种资源与*OFDI*的关系有重要的正向调节作用,该结果支持 H_4 。然而,政府参与企业程度变量与3种资源交互项的系数均为负值,并且不显著,该结果表明政府参与程度对于3种资源与*OFDI*的关系没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所以不支持 H_5 。

表1 制度调节作用回归结果
Table 1 Regression Results of the Institution Moderating Effects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模型8
控制变量								
<i>EDE</i>	0.325	1.566***	1.476***	1.158***	1.272***	1.901***	1.771***	1.734***
<i>OPEN</i>	0.607***	0.719***	0.842***	0.908***	0.900***	0.679***	0.694***	0.699***
资源变量								
<i>FI</i> (H_1)	0.437**	-0.456*	-1.514***	-0.285	-0.490**	-0.761**	-0.650*	-0.614*
<i>RD</i> (H_2)	0.050	-0.268	-0.279*	-1.140***	-0.110	-0.246	-0.244	-0.258
<i>TMT</i> (H_3)	0.021**	0.074	0.003	0.030	-1.044***	0.069	0.070	0.083
制度变量								
<i>GE</i>		7.758***	-33.290***	-8.342**	-4.973**	8.363***	8.085***	7.994***
<i>GI</i>		0.604***	0.854***	0.807***	0.758***	0.653***	0.638***	0.634***
调节作用								
<i>GE</i> · <i>FI</i> (H_4)			5.220***					
<i>GE</i> · <i>RD</i> (H_4)				4.541***				
<i>GE</i> · <i>TMT</i> (H_4)					5.105***			
<i>GI</i> · <i>FI</i> (H_5)						-0.038		
<i>GI</i> · <i>RD</i> (H_5)							-0.028	
<i>GI</i> · <i>TMT</i> (H_5)								-0.029
样本数	203	203	203	203	203	203	203	203
<i>F</i> 统计值	101.386***	108.851***	109.863***	115.632***	124.878***	95.611***	95.139***	95.032***
R^2	0.720	0.796	0.819	0.827	0.837	0.798	0.797	0.797
调整 R^2	0.713	0.789	0.812	0.819	0.831	0.789	0.789	0.788

注:*为统计结果在10%的水平显著(双尾检验),**为统计结果在5%的水平显著(双尾检验),***为统计结果在1%的水平显著(双尾检验),下同。

5.2 扩展分析

如前所述,由于母国各地区间在制度上的异质性,同一制度因素在不同地区对于企业 OFDI 影响的程度和方式都可能不同。结合区域经济的发展状况和经济地区的区域特征,本研究采用传统的三大地区的划分方法,按地理位置将样本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中部地区包括湖北、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河北、湖南,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四川、广西、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选定东部地区为基组,引入虚拟变量 D_1 表示西部地区, D_2 表示中部地区,则有

$$D_1 = \begin{cases} 1, & \text{西部地区} \\ 0, & \text{非西部地区} \end{cases} \quad (5)$$

$$D_2 = \begin{cases} 1, & \text{中部地区} \\ 0, & \text{非中部地区} \end{cases} \quad (6)$$

表 2 给出对 3 个地区分别估计方程(4)式的结果。地区差异项显示,两个虚拟变量的系数均为负值且呈统计显著性。 D_1 的系数显示非西部地区 OFDI 明显高于西部地区, D_2 的系数则表明中部以外地区的 OFDI 明显高于中部地区。总的来说,这些结果表明东部地区 OFDI 高于其他两个地区。那么,对外投资的这种地区间差异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制度因素作用的结果。

在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政府资源配置能力对于 3 种资源与 OFDI 关系的调节作用显著,表明总样本中的有关结果主要是由这两个地区的结果决定的。而政府资源配置能力对东部地区各种资源与 OFDI 关系的调节作用相对来说比较有限,政府资源配置能力对有形资源和技术市场资源与 OFDI 的关系起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政府参与企业程度在 3 个地区的调节作用都比较有限,仅仅对中部和东部研发资源与 OFDI 的关系起正向调节作用。总的来说,对比总样本和 3 个地区,政府资源配置能力是基本一致的,而政府参与企业程度是略有差异的。

6 结果讨论

本研究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对回归结果做进一步讨论。

(1) 本研究发现有形资源和技术市场资源对 OFDI 起显著作用,该结果支持基于资源的理论^[19],与基于发达经济体企业 OFDI 所得出的结论并无不同。Tseng 等^[18]发现有形资源对于美国企业 OFDI 具有显著的重要性。虽然经典跨国公司理论认为无形资源决定企业 OFDI,即企业 OFDI 无非是为了在海外利用自己的无形资源或寻求新的无形资源,但若干研究发现有形资源对 OFDI 依然重要,这并不难解释,因为无形资源的利用毕竟要以有形资源为依托和基础。技术市场资源因为与交易成本密切相关,

表 2 制度调节作用的地区差异

Table 2 Regional Differences of Institution Moderating Effects

变量	地区差异	西部	中部	东部
控制变量				
EDE	2.496***	1.411*	5.659***	2.635***
OPEN	0.489***	-0.097	-0.368	0.514**
资源变量				
FI	3.671***	0.723**	-1.622	0.334
RD	1.225	-3.285	-4.173**	-2.452**
TMT	0.687**	0.174	-1.488	0.961*
制度变量				
GE	5.172***	3.172***	2.089**	2.236*
GI	0.970***	2.039	0.709**	0.650**
调节作用				
GE · FI	2.662***	3.865***	4.819**	2.316**
GE · RD	3.825**	2.443**	4.834**	5.761
GE · TMT	4.435***	3.203**	11.062**	3.336*
GI · FI	-0.577**	-0.352	-5.916*	-0.832
GI · RD	1.001	1.504	11.455***	6.529***
GI · TMT	-0.562	-1.430	-1.161	-0.474
虚拟变量				
D_1	-0.823***			
D_2	-0.908***			
样本数	203	203	203	203
F 统计值	77.944***	25.705***	19.128***	44.584***
R ²	0.862	0.872	0.816	0.912
调整 R ²	0.851	0.838	0.774	0.891

所以应当对企业 OFDI 产生重要影响,本研究证实了这一点。然而,这一结果仍然有点出乎意料,因为与发达经济体相比,新兴经济体技术交易市场通常并不发达。但是细致分析,这一结果也在情理之中,正是因为自身的研发能力比较弱,所以很多企业依靠技术市场获得研发资源(特别是先进技术和专利性

产品)。事实上,表1显示企业研发资源对OFDI没有显著影响,恰好印证了本研究的判断,并且与Yiu等^[33]的研究结果相一致,他们发现研发并不是诱发中国企业OFDI的主要因素。企业研发资源变量不显著,表明新兴经济体企业OFDI与传统跨国公司OFDI的动因不同,它们进行OFDI并不是为了在海外利用自身的所有权优势,尤其是技术优势。正因为如此,很多学者认为Dunning等^[9]的折衷范式无法解释新兴经济体企业OFDI的动因,本研究为这一观点提供了实证证据。

(2) 本研究发现政府资源配置能力对于3种资源与OFDI的关系有重要的正向调节作用,这一结果凸显了政府在新兴经济体企业OFDI中的决定作用。已有研究主要基于企业水平的资源和能力等因素分析企业OFDI的动因,忽略了外部制度环境(特别是政府)的作用。基于制度的理论认为,政府影响组织的行动^[13-14]。虽然一些研究认为政府因素影响新兴经济体企业OFDI的水平和本质^[3,34],但由于缺乏数据,该论点基本上没有得到检验。本研究发现政府资源配置不仅对企业OFDI有直接作用,同时通过作用于各种资源间接影响企业OFDI,这一结果为以往理论研究中关于政府对OFDI产生重要作用的理论观点提供了实证证据。

(3) 本研究扩展分析的结果表明,政府资源配置能力对于资源与OFDI关系的调节作用并非普遍一致,政府资源配置能力的调节作用呈现由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逐渐递减的特征。这反映了市场机制在各地发展的不均衡性,即市场机制发展由西向东逐渐增强,而政府作用则由西向东逐渐减弱。所以,西部和中部地区企业OFDI主要依赖于政府的主导作用,而东部地区OFDI则主要是企业自主行为。从企业内部因素和外部环境的关系来看,中部和西部地区企业OFDI主要依赖外部制度环境对资源的补充作用,而东部地区企业OFDI则更多地是靠企业自身的竞争优势而非外部制度支持。所以东部地区企业OFDI可以用传统理论范式来解释,而其他地区企业OFDI则呈现更多新兴经济体企业OFDI的特征,无法用经典跨国公司理论来解释。

(4) 本研究发现不论在总样本中还是在分地区样本中,虽然政府参与企业程度对于企业OFDI有直接影响,但对于资源因素与OFDI关系的调节作用非常有限,这与政府资源配置能力的显著调节作用形成鲜明对照。这表明宏观与微观层面的不同制度变量影响企业OFDI的机制不同,所以笼统地讨论制度对OFDI作用的方向和强度容易掩盖不同制度变量对于OFDI的不同作用。

本研究结果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1) 新兴经济体企业普遍研发能力不足,政府可以通过发展技术市场机制帮助企业获得所需要的研发资源,促进企业国际化战略。

(2) 以往政府OFDI政策多为行业政策,即“鼓励”和“限制”不同行业OFDI以及对企业提供融资

帮助,如低于市场利率水平的银行贷款。后者常常局限于个案处理,缺乏一致性、公平性和可持续性。本研究发现,在市场机制尚未充分发展的情况下,政府应当充分发挥资源配置对OFDI的作用,由于新兴经济体企业普遍缺乏资源,政府应当通过其资源配置能力弥补企业在占有资源方面的不足,这种政策配置兼顾所有企业,具有公平性和间接性,减少直接干预企业带来的负效果

(3) 本研究结果显示,政府参与企业程度对企业OFDI没有显著作用,这进一步表明政府直接干预企业对于OFDI的影响非常有限,而且这种干预有利有弊,本研究反映的可能是利弊相抵的结果。所以,政府应当使用间接而非直接手段促进企业OFDI。

本研究结果对于企业管理人员的主要指导意义在于,在各种内部资源不足的情况下,企业必须注重借助外部环境特别是政府的作用来克服在占有资源方面的劣势,从而实现国际化。当然,管理人员必须意识到,外部环境特别是政府对企业获得资源的重要性可能导致企业过度依赖政府来实现其战略目标,从而削弱管理人员发展企业家能力的动力,从长远来讲,这会导致企业竞争能力的下降,并削弱企业作为市场竞争者的公信力,若干中国国有企业竞购美国公司被拒绝就是最好的例证。所以,企业在依赖政府获取资源的同时,必须注重发展自身的核心竞争力,逐渐淡化对政府的依赖。

7 结论

本研究在整合制度观与资源观的基础上,考察中国企业如何利用母国制度优势克服竞争性资源占有方面的劣势从而实现国际化战略目标,与传统思路分别分析各种类型内部资源和企业外部制度因素对企业国际化的作用不同,本研究分析母国制度因素对资源与国际化关系的调节作用。利用2003年至2009年中国省级OFDI面板数据所进行的实证分析表明,政府资源配置能力对不同类型的资源与OFDI的关系确实起重要的调节作用,这种调节作用在市场机制发展较为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尤其明显。

本研究有若干局限性,这些局限性同时表明未来的研究路径。① 受数据可得性影响,本研究考察的资源主要是指企业所在地区的资源,而非企业本身的内部资源。未来研究可以利用企业水平数据细致分析企业内部资源与外部环境的互动关系及其对于企业OFDI的影响。② 本研究分析了政府对于企业“走出去”战略的影响。由于不同级别的政府有不同的目标和诉求,对企业形成不同的制度压力,所以未来研究可以分析不同级别的政府对于企业OFDI影响的差别。③ 受数据可得性限制,本研究没有充分控制行业效应。在新兴经济体,政府对于不同行业管制的程度不同,一些行业接近于充分竞争,而另外一些行业则处于政府垄断或半垄断状态。所以,未来研究应当分析政府对不同行业企业OFDI的不同影响。

参考文献:

- [1] Nachum L, Zaheer S. The persistence of distance? The impact of technology on MNE motivations for foreign investment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5, 26(8): 747-767.
- [2] 张小济. “十二五”时期我国发展的国际环境和对外开放战略 [J]. *国际技术装备与贸易*, 2011, 14(5): 20-21.
Zhang Xiaoji. The “12th Five-Year Plan” development of China in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and the strategy of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J]. *World Technology Trade Magazine*, 2011, 14(5): 20-21. (in Chinese)
- [3] Child J, Rodrigues S B.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ese firms: A case for theoretical extension [J].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2005, 1(3): 381-410.
- [4] 熊伟, 熊英. 论文化全面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机制: 以修正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为基础 [J]. *金融经济*, 2009(20): 21-23.
Xiong Wei, Xiong Ying. Impact of culture on outward FDI: Based on modified OLI model [J]. *Financial & Economy*, 2009(20): 21-23. (in Chinese)
- [5] Shenkar O. Becoming multinational: Challenges for Chinese firms [J]. *Journal of Chinese Economic and Foreign Trade Studies*, 2009, 2(3): 149-162.
- [6] Luo Y, Xue Q, Han B. How emerging market governments promote outward FDI: Experience from China [J].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2010, 45(1): 68-79.
- [7] 阎大颖, 洪俊杰, 任兵.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 基于制度视角的经验分析 [J]. *南开管理评论*, 2009, 12(6): 135-142, 149.
Yan Daying, Hong Junjie, Ren Bing. The determinants of 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 by Chinese enterprises: An empirical study from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J]. *Nankai Business Review*, 2009, 12(6): 135-142, 149. (in Chinese)
- [8] Buckley P J, Clegg L J, Cross A R, Liu X, Voss H, Zheng P. The determinants of Chinese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7, 38(4): 499-518.
- [9] Dunning J, Lundan S M. Institutions and the OLI paradigm of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J].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08, 25(4): 573-593.
- [10] Deng P. Why do Chinese firms tend to acquire strategic assets in international expansion? [J].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2009, 44(1): 74-84.
- [11] Barney J. Firm resources and sustained competitive advantage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1991, 17(1): 99-120.
- [12] Peng M W. Towards an institution-based view of business strategy [J].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02, 19(2): 251-267.
- [13] Scott W R. The adolescence of institutional theory [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87, 32(4): 493-511.
- [14] North D.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11-19.
- [15] Scott W R.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 [M]. Thousand Oaks, CA: Sage, 2001: 45-76.
- [16] Hoskisson R E, Eden L, Lau C M, Wright M. Strategy in emerging economies [J].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0, 43(3): 249-267.
- [17] Foss N J. *Resources, firms, and strategies: A reader in the resource-based perspective*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52-59.
- [18] Tseng C H, Tansuhaj P, Hallagan W, McCullough J. Effects of firm resources on growth in multinationality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7, 38(6): 961-974.
- [19] Barney J B. Strategic factor markets: Expectations, luck and business strategy [J]. *Management Science*, 1986, 32(10): 1231-1241.
- [20] Kotabe M, Srinivasan S S, Aulakh P S. Multinationality and firm performance: The moderating role of R&D and marketing capabilities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2, 33(1): 79-97.
- [21] Cohen W M, Levinthal D A. Absorptive capacity: A new perspective on learning and innovation [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90, 35(1): 128-152.
- [22] Hedlund G. A model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and the N-form corporation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4, 15(S2): 73-90.
- [23] Malnight T M. Globalization of an ethnocentric firm: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5, 16(2): 119-141.
- [24] Caves R E, Crookell H, Killing J P. The imperfect market for technology licenses [J]. *Oxford Bulletin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83, 45(3): 249-267.
- [25] Maskus K E, Penubarti M. How trade-related ar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5, 39(3/4): 227-248.
- [26] Branstetter L, Fisman R, Foley C F, Saggi K.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mitation,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heory and evidence [R]. Massachusetts: NBER Working Paper, 2007: 1-36.
- [27] Khanna T, Palepu K. The future of business groups in emerging markets: Long-run evidence from Chile [J].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0, 43(3): 268-285.

- [28] Lu Y, Yao J. Impact of state ownership and control mechanisms on the performance of group affiliated companies in China [J].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06, 23(4):485-503.
- [29] Majocchi A, Zuchella A.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performance: Findings from a set of Italian SMEs [J]. *International Small Business Journal*, 2003, 21(3):249-268.
- [30] 官建成, 王晓静.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研究 [J]. *中国软科学*, 2007(2):59-65.
Guan Jiancheng, Wang Xiaojing. The Research on the determinants of China's 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 [J]. *China Soft Science*, 2007(2):59-65. (in Chinese)
- [31] Sharma N. The role of pure and quasi-moderators in services: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ongoing customer-service-provider relationships [J]. *Journal of Retailing and Consumer Services*, 2003, 10(4):253-262.
- [32] 任海云, 师萍. 企业 R&D 投入与绩效关系研究综述: 从直接关系到调节变量的引入 [J]. *科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10, 31(2):143-151.
Ren Haiyun, Shi Ping. Literature review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D investment and firm performance: From direct effects to moderating effects [J]. *Science of Science and Management of S. & T.*, 2010, 31(2):143-151. (in Chinese)
- [33] Yiu D W, Lau C M, Bruton G D. International venturing by emerging economy firms: The effects of firm capabilities, home country networks, and corporate entrepreneurship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7, 38(4):519-540.
- [34] Peng M W, Wang D Y L, Jiang Y. An institution-based view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rategy: A focus on emerging economies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8, 39(5):920-936.

Chinese Outward FDI Drivers, Institution Moderation and Regional Differences

Chen Yan, Yang Huan, Zhang Bi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Bei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Beijing 100876, China

Abstract: Integrating the institution-based view and resource-based view in a unified framework, this paper examines how Chinese enterprises take advantage of host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to overcome their resource constraints and achieve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objectives. 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method which analyze the impact of internal resources and external institutional factors on enterprise's internationalization, this study conducted moderation method to analyze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host institutional factors between resource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 Employing data of Chinese provinces for the period between 2003 and 2009 to test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governments ability of allocating resources positively mode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sources and outward FDI. Furthermore, we also find that the moderating role of government has different direction and strength and is affected by regions of China, highlighting that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shaping internationalization outcomes is not without conditions. The findings of the paper provide a new and powerful explanation of why resource-constrained emerging market enterprises are capable of embarking on internationalization.

Keyword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stitution-based views; moderation effect; regional differences

Received Date: September 26th, 2011 **Accepted Date:** April 24th, 2012

Funded Project: Supported by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71073087),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Foundation of China(10YJC790028) and Beijing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9122019)

Biography: Dr. Chen Yan, a Shandong Qufu native(1970 -), graduated from Jilin University and is a professor and Ph. D. advisor in the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at Bei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His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nagement, transnational operation, etc. E-mail: itrade8@gmail.com

□